

附录一 铭传

《栾城集·墓志铭》

予兄子瞻谪居海南四年春正月，今天子即位，推恩海内，泽及鸟兽。夏六月，公被命渡海北归。明年，舟至淮浙。秋七月，被病卒于毗陵。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，其君子相吊于家，讻闻四方，无贤愚皆咨嗟出涕，太学之士数百人，相率饭僧慧林佛舍。呜呼，斯文坠矣，后生安所复仰！公始病，以书属辙曰：“即死，葬我嵩山下，子为我铭。”辙执书，哭曰：“小子忍铭吾兄！”公讳轼，姓苏氏，字子瞻，一字和仲，世家眉山。曾大父讳杲，赠太子太保，妣宋氏，追封昌国太夫人。大父讳序，赠太子太傅，妣史氏，追封嘉国太夫人。考讳洵，赠太子太师，妣程氏，追封成国太夫人。公生十年，而先君宦学四方，太夫人亲授以书。闻古今成败，辄能语其要。太夫人尝读《东汉

史》，至《范滂传》，慨然太息。公侍侧曰：“轼若为滂，夫人亦许之否乎？”太夫人曰：“汝能为滂，吾顾不能为滂母耶？”公亦奋厉有当世志。太夫人喜曰：“吾有子矣。”比冠，学通经史，属文日数千言。嘉祐二年，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，疾时文之诡异，思有以救之。梅圣俞时与其事，得公《论刑赏》以示文忠。文忠惊喜，以为异人，欲以冠多士，疑曾子固所为，子固，文忠门下士也，乃置公第二。复以《春秋》对义，居第一，殿试中乙科，以书谢诸公。文忠见之，以书语圣俞曰：“老夫当避此人，放出一头地。”士闻者始哗不厌，久乃信服。丁太夫人忧，终丧。五年，授河南福昌主簿，文忠以直言荐之。秘阁试六论，旧不起草，以故文多不工，公始具草，文义粲然，时以为难。比答制策，复入三等。除大理评事，签书凤翔府判官。长吏意公文人，不以吏事责之，公尽心其职，老吏畏服。关中自元昊叛命，人贫役重，岐下岁以南山木筏，自渭入河，经砥柱之险，衙前以破产者相继也。公遍问老校，曰：“木筏之害，本不至此，若河渭未涨，操筏者以时进止，可无重费也，患其乘河渭之暴，多方害之耳。”公即修衙规，使衙前得自择水工，筏行无虞。乃言于府，使得系籍，自是衙前之害减半。治平二年，罢还，判登闻鼓院。英宗在藩闻公名，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，宰相限以近例，欲召试秘阁，上

曰：“未知其能否故试，如苏轼有不能耶？”宰相犹不可，及试二论，皆入三等，得直史馆。丁先君忧，服除，时熙宁二年也。王介甫用事，多所建立，公与介甫议论素异，既还朝，置之宫告院。四年，介甫欲变更科举，上疑焉，便两制三馆议之。公议上。上悟曰：“吾固疑此，得苏轼议，意释然矣。”即日召见，问：“何以助朕？”公辞避久之，乃曰：“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，听言太广，进人太锐，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以来，然后应之。”上竦然听受，曰：“卿三言，朕当详思之。”介甫之党不悦，命摄开封推官，意以多事困之。公决断精敏，声闻益远。会上元，有旨市浙灯，公密疏，旧例无有，不宜以玩好示人，即有旨罢。殿前初策进士，举子希合，争言祖宗法制非是。公为考官，退拟答以进，深中其病。自是论事愈力，介甫愈恨，御史知杂事者为诬奏公过失，穷治无所得。公未尝以一言自辩，乞外任避之。通判杭州。是时，四方行青苗、免役、市易，浙西兼行水利、盐法。公于其间，常因法以便民，民赖以少安。高丽入贡使者，凌蔑州郡。押伴使臣皆本路管库，乘势骄横，至与钤辖亢礼。公使人谓之曰：“远夷慕化而来，理必恭顺，今乃尔暴恣，非汝导之，不至是也，不悛当奏之。”押伴者惧，为之小戢。使者发币于官吏，书称甲子。公却之曰：“高丽于本朝称臣，而不禀正朔，吾安敢受！”使者亟

易书称熙宁，然后受之。时以为得体。吏民畏爱，及罢去，犹谓之学士而不言姓。自杭徙知密州。时方行手实法，使民自疏财产以定户等，又使人得告其不实，司农寺又下诸路，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。公谓提举常平官曰：“违制之坐，若自朝廷，谁敢不从，今出于司农，是擅造律也，若何？”使者惊曰：“公姑徐之。”未几，朝廷亦知手实之害，罢之。密人私以为幸。郡尝有盗窃发而未获，安抚转运司忧之，遣一三班使臣领悍卒数千人，入境捕之。卒凶暴恣行，以禁物诬民，入其家争斗，至杀人，畏罪惊散，欲为乱。民诉之，公投其书，不视，曰：“必不至此。”溃卒闻之少安。徐使人招出，戮之。自密徙徐。是岁，河决曹村，泛于梁山泊，溢于南清河，城南两山环绕，吕梁、百步扼之，汇于城下。涨不时洩，城将败，富民争出避水。公曰：“富民若出，民心动摇，吾谁与守？吾在是，水决不能败城。”驱使复入。公履屨杖策，亲入武卫营，呼其卒长，谓之曰：“河将害城，事急矣，虽禁军，宜为我尽力。”卒长呼曰：“太守犹不避涂潦，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。”执挺入火伍中，率其徒短衣徒跣，持畚鍤以出，筑东南长堤，首起戏马台，尾属于城。堤成，水至堤下，害不及城，民心乃安。然雨日夜不止，河势益暴，城不沉者三板。公庐于城上，过家不入，使官吏分堵而守，卒完城以闻。复请调来岁夫，增筑故

城，为木岸，以虞水之再至，朝廷从之。论事，诏褒之，徐人至今思焉。徙知湖州，以表谢上。言事者撻其语以为谤，遣官逮赴御史狱。初，公既补外，见事有不便于民者，不敢言，亦不敢默视也，缘诗人之义，托事以讽，庶几有补于国。言者从而媒孽之，上初薄其过，而浸润不止，至是不得已从其请。既付狱吏，必欲置之死，锻炼久之，不决，上终怜之，促具狱，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。公幅巾芒屨，与田父野老，相从溪谷之间，筑室于东坡，自号东坡居士。五年，上有意复用，而言者沮之。上手札徙汝州，略曰：“苏轼黜居思咎，阅岁滋深，人材实难，不忍终弃。”未至，上书自言有饥寒之忧，有田在常，愿得居之。书朝入，夕报可，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。会晏驾，不果复用。至常。以哲宗即位，复朝奉郎，知登州。至登，召为礼部郎中。公旧善门下侍郎司马君实及知枢密院章子厚，二人冰炭不相入。子厚每以谗侮困君实，君实苦之，求助于公。公见子厚曰：“司马君实时望甚重。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，法正曰：‘靖之浮誉，播流四海，若不加礼，必以贱贤为累。’先主纳之，乃以靖为司徒。许靖且不可慢，况君实乎？”子厚以为然，君实赖以少安。既而朝廷缘先帝意，欲用公，除起居舍人。公起于忧患，不欲骤履要地，力辞之，见宰相蔡持正自言，持正曰：“公徊翔久矣，朝中无出公

右者。”公固辞。持正曰：“今日谁当在公前者？”公曰：“昔林希同在馆中，年且长。”持正曰：“希固当先公耶？”卒不许。然希亦由此继补记注。元祐元年，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，即改赐银绯。二月，迁中书舍人。时君实方议改免役为差役。差役行于祖宗之世，法久多弊，编户充役不习，府吏虐使之，多以破产，而狭乡之民，或有不得休息者。先帝知其然，故为免役，使民以户高下出钱，而无执役之苦。行法者不循上意，于雇役实费之外，取钱过多，民遂以病。若量出为入，毋多取于民，则足矣。君实为人，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，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，欲一切以差役代之。方差官置局，公亦与其选，独以实告，而君实始不悦矣。尝见之政事堂，条陈不可。君实忿然，公曰：“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，公为谏官，争之甚力，魏公不乐，公亦不顾，轼昔闻公道其详，岂今日作相，不许轼尽言耶？”君实笑而止。公知言不用，乞补外，不许。君实始怒，有逐公意矣，会其病卒乃已。时台谏官多君实之人，皆希合以求进，恶公以直形己，争求公瑕疵。既不可得，则因缘熙宁谤讪之说以病公，公自是不安于朝矣。寻除翰林学士。二年，复除侍读。每进读至治乱盛衰、邪正得失之际，未尝不反覆开导，觐上有所觉悟。上虽恭默不言，闻公所论说，辄首肯，喜之。三年，权知礼部贡举。会大雪苦寒，士坐庭中，噤不

能言，公宽其禁约，使得尽其技。而巡铺内臣伺其坐起，过为凌辱，公以其伤动士心，亏损国体，奏之。有旨送内侍省撻而逐之，士皆悦服。尝侍上读《祖宗宝训》，因及时事，公历言今赏罚不明，善恶无所劝沮；又黄河势方西流，而强之使东；夏人寇镇戎，杀掠几万人，帅臣掩蔽不以闻，朝廷亦不问；事每如此，恐浸成衰乱之渐。当轴者恨之。公知不见容，乞外任。四年，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。时谏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，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刺时事，大臣议逐之岭南。公密疏言：朝廷若薄确之罪，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，若深罪确，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，谓宜皇帝降敕置狱逮治，而太皇太后内出手诏赦之，则仁孝两得矣。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。公出郊未发，遣内侍赐龙茶、银合，用前执政恩例，所以慰劳甚厚。及至杭，吏民习公旧政，不劳而治。岁适大旱，饥疫并作，公请于朝，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，故米不翔贵，复得赐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饥者。明年方春，即减价糴常平米，民遂免大旱之苦。公又多作饘粥药剂，遣吏挟医，分坊治病，活者甚众。公曰：“杭，水陆之会，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。”乃裒羡缗得二千，复发私橐得黄金五十两，以作病坊，稍畜钱粮以待之。至于今不废。是秋，复大雨，太湖泛滥害稼。公度来岁必饥，复请于朝，乞免上供米半，又多乞度牒以糴常平米，

并义仓所有，皆以备来岁出糴，朝廷多从之。由是吴越之民，复免流散。杭本江海之地，水泉咸苦，居民稀少。唐刺史李泌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，民足于水，故井邑日富。及白居易复浚西湖，放水入运河，自河入田，所溉至千顷。然湖水多葑，自唐及钱氏，岁辄开治，故湖水足用，近岁废而不理，至是，湖中葑田积二十五万余丈，而水无几矣。运河失湖水之利，则取给于江潮，潮浑浊多淤，河行闾闾中，三年一淘，为市井大患，而六井亦几废。公始至，浚茅山、盐桥二河。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，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，复造堰闸，以为湖水畜泄之限，然后潮不入市，且以余力复完六井，民稍获其利矣。公间至湖上，周视良久，曰：今欲去葑田，葑田如云，将安所置之？湖南北三十里，环湖往来，终日不达，若取葑田积之湖中，为长堤以通南北，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。吴人种菱，春辄芟除，不遗寸草，葑田若去，募人种菱，收其利以备修湖，则湖当不复堙塞。乃取救荒之余，得钱粮以贯、石数者万。复请于朝，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。堤成，植芙蓉、杨柳其上，望之如图画，杭人名之苏公堤。杭僧有净源者，旧居海滨，与舶客交通牟利，舶至高丽，交誉之。元丰末，其王子义天来朝，因往拜焉。至是源死，其徒窃持其画像附舶往告，义天亦使其徒附舶来祭。祭讫，乃言国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、

太皇太后寿。公不纳而奏之曰：高丽久不入贡，失赐予厚利，意欲来朝，以未测朝廷所以待之薄厚，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，礼意微薄，盖可见矣，若受而不答，则选夷或以怨怒，因而厚赐之，正堕其计。臣谓朝廷宜勿与知，而使州郡以理却之。然庸僧猾商，敢擅招诱外夷，邀求厚利，为国生事，其渐不可长，宜痛加惩创。朝廷皆从之。未几，高丽贡使果至。公按旧例，使之所至吴越七州。实费二万四千余缗，而民间之费不在，乃令诸郡量事裁损。比至，民获交易之利，而无侵挠之害。浙江潮自海门东来，势如雷霆，而浮山峙于江中，与渔浦诸山，犬牙相错，洄洑激射，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。公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，并山而东，凿为运河，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，以达于江，又并山为岸，不能十里以达于龙山大慈浦，自浦北折抵小岭，凿岭六十五丈，以达于岭东古河，浚古河数里，以达于龙山运河，以避浮山之险，人皆以为便。奏闻，有恶公成功者。会公罢归，使代者尽力排之，功以不成。公复言：三吴之水，潴为太湖，太湖之水，溢为松江以入海，海日两潮，潮浊而江清，潮水尝欲淤塞江路，而江水清驶，随辄涤去，海口常通，则吴中少水患。昔苏州以东，公私船皆以篙行，无陆挽者，自庆历以来，松江大筑挽路，建长桥以扼塞江路，故今三吴多水，欲凿挽路为千桥以迅江势。

亦不果用，人皆恨之。公二十年间，再莅此州，有德于其人，家有画像，饮食必祝，又作生祠以报。六年，召入为翰林承旨，复侍迓英，当轴者不乐，风御史攻公。公之自汝移常也，受命于宋，会神考晏驾，哭于宋，而南至扬州。常人为公买田，书至，公喜作诗，有“闻好语”之句。言者妄谓公闻讳而喜，乞加深谴。然诗刻石有时日，朝廷知言者之妄，皆逐之。公惧，请外补，乃以龙图阁学士守颍。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，吏不究本末，决其陂泽，注之惠民河，河不能胜，则陈亦多水，至是又将凿邓艾沟，与颍河并，且凿黄堆，注之于淮，议者多欲从之。公适至，遣吏以水平准之，淮之涨水，高于新沟几一丈，若凿黄堆，淮水顾流浸州境，决不可为，朝廷从之。郡有宿贼尹遇等数人，群党惊劫，杀变主及捕盗吏兵者非一，朝廷以名捕不获，被杀者噤不敢言。公召汝阴尉李直方，谓之曰：“君能擒此，当力言于朝，乞行优赏；不获，亦以不职奏免君矣。”直方退，緝知群盗所在，分命弓手往捕其党，而躬往捕遇。直方有母年九十，母子泣别而行。手戟刺而获之，然小不应格，推赏不及。公为言于朝，请以年劳，改朝散郎阶，为直方赏。朝廷不从。其后吏部以公当迁以符会考，公自谓已许直方，卒不报。七年，徙扬州。发运司旧主东南漕法，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，不得留难。故操舟者富厚，以官舟为家，

补其弊漏，而周船夫之乏困，故其所载，率无虞而速达，近岁不忍征商之小失，一切不许，故舟弊人困，多盗所载以济饥寒，公私皆病，公奏乞复故，朝廷从之。未阅岁，以兵部尚书召还，兼侍读。是岁，亲祀南郊，为卤簿使，导驾入太庙。有贵戚以其车从争道，不避仗卫，公于车中劾奏之。明日，中使传命申敕，有司严整仗卫。寻迁礼部，复兼端明殿、翰林侍读二学士。高丽遣使请书于朝，朝廷以故事尽许之。公曰：“汉东平王请诸子及《太史公书》，犹不肯予，今高丽所请，有甚于此，其可予之乎？”不听。公临事必以正，不能俯仰随俗，乞守郡自效。八年，以二学士知定州。定久不治，军政尤弛，武卫卒骄惰不教，军校蚕食其廩赐，故不敢何问。公取其贪污甚者，配隶远恶，然后缮修营房，禁止饮博。军中衣食稍足，乃部勒以战法，众皆畏服。然诸校多不自安者，卒史复以赃诉其长，公曰：“此事吾自治则可，汝若得告，军中乱矣。”亦决配之，众乃定。会春大阅，军礼久废，将吏不识上下之分，公命举旧典，元帅常服坐帐中，将吏戎服奔走执事。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，耻之，称疾不出。公召书吏作奏，将上，光祖震恐而出，讫事，无敢慢者。定人言，自韩魏公去，不见此礼至今矣。北戎久和，边兵不试，临事有不可用之忧，惟沿边弓箭社兵与寇为邻，以战射自卫，犹号精锐。故相庞公

守边，因其故俗立队伍，将校出入，赏罚缓急可使。岁久，法弛，复为保甲所挠，渐不为用。公奏为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，长吏以时训劳，不报，议者惜之。时方例废旧人，公坐为中书舍人日草责降官制，直书其罪，诬以谤讪，绍圣元年，遂以本官知英州。寻复降一官，未至，复以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惠州。公以侍从齿岭南编户，独以少子过自随，瘴疠所侵，蛭蝨所侮，胸中泊然无所蒂芥。人无贤愚，皆得其欢心，疾苦者畀之药，殒毙者纳之窆。又率众为二桥以济病涉者，惠人爱敬之。居三年，大臣以流窜者为未足也，四年，复以琼州别驾安置昌化。昌化非人所居，饮食不具，药石无有，初僦官屋以庇风雨，有司犹谓不可，则买地筑室，昌化士人畚土运甃以助之，为屋三间。人不堪其忧，公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，时从其父老游，亦无间也。元符三年，大赦，北还。初徙廉，再徙永，已乃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，居从其便。公自元祐以来，未尝以岁课乞迁，故官止于此，勋上轻车都尉封武功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。将居许，病暑，暴下，中止于常。建中靖国元年六月，请老，以本官致仕，遂以不起。未终旬日，独以诸子侍侧，曰：“吾生无恶，死必不坠。慎无哭泣以怛化。”问以后事，不答，湛然而逝，实七月丁亥也。公娶王氏，追封通义郡君，继室以其女弟，封同安郡君，亦先公而卒。子三人，

长曰迈，雄州防御推官，知河间县事。次曰迨，次曰过，皆承务郎。孙男六人，箴、符、箕、籥、筌、箒。明年闰六月癸酉，葬于汝州郟城县钓台乡上瑞里。公之于文，得之于天。少与辙皆师先君，初好贾谊、陆贽书，论古今治乱，不为空言。既而读《庄子》，喟然叹息曰：“吾昔有见于中，口未能言，今见《庄子》，得吾心矣。”乃出《中庸论》，其言微妙，皆古人所未喻。尝谓辙曰：“吾视今世学者，独子可与我上下耳。”既而谪居于黄，杜门深居，驰骋翰墨，其文一变，如川之方至，而辙瞠然不能及矣。后读释氏书，深悟实相，参之孔、老，博辩无碍，茫然不见其涯也。先君晚岁读《易》，玩其爻象，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，以观其词，皆迎刃而解，作《易传》未完，疾革，命公述其志。公泣受命，卒以成书，然后千载之微言，焕然可知也。复作《论语说》，时发孔氏之秘。最后居海南，作《书传》，推明上古之绝学，多先儒所未达。既成三书，抚之叹曰：“今世要未能信，后有君子，当知我矣。”至其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，率皆过人。有《东坡集》四十卷、《后集》二十卷、《奏议》十五卷、《内制》十卷、《外制》三卷。公诗本似李、杜，晚喜陶渊明，追和之者几遍，凡四卷。幼而好书，老而不倦，自言不及晋人，至唐褚、薛、颜、柳，仿佛近之。平生笃于孝友，轻财好施。伯父太白早亡，

子孙未立，杜氏姑卒未葬，先君没，有遗言，公既除丧，即以礼葬姑，及当可荫补，复以奏伯父之曾孙彭。其于人，见善称之，如恐不及，见不善斥之，如恐不尽，见义勇于敢为，而不顾其害。用此，数困于世，然终不以为恨。孔子谓伯夷、叔齐古之贤人，曰：“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。”公实有焉。铭曰：

苏自栳城，西宅于眉。世有潜德，而人莫知。猗与先君，名施四方。公幼师焉，其学以光。出而从君，道直言忠。行险如夷，不谋其躬。英祖擢之，神考试之。亦既知矣，而未克施。晚侍哲皇，进以诗书。谁实间之，一斥而疏。公心如玉，焚而不灰。不变生死，孰为去来。古有微言，众说所蒙。手发其枢，恃此以终。心之所涵。遇物则见。声融金石，光溢云汉。耳目同是，举世毕知。欲造其渊，或眩以疑。绝学不继，如已断弦。百世之后，岂无其贤。我初从公，赖以有知。抚我则兄，诲我则师。皆迁于南，而不同归。天实为之，莫知我哀。

《宋史·苏轼传》

苏轼，字子瞻，眉州眉山人。生十年，父洵游学四方，母程氏亲授以书，闻古今成败，辄能语其要。

程氏读东汉《范滂传》，慨然太息，轼请曰：“轼若为滂，母许之否乎？”程氏曰：“汝能为滂，吾顾不能为滂母邪！”比冠，博通经史，属文日数千言，好贾谊、陆贽书。既而读《庄子》，叹曰：“吾昔有见，口未能言，今见是书，得吾心矣。”

嘉祐二年，试礼部。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，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，得轼《刑赏忠厚论》，惊喜，欲擢冠多士，犹疑其客曾巩所为，但置第二，复以《春秋》对义居第一，殿试中乙科。后以书见修，修语梅圣俞曰：“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。”闻者始哗不厌，久乃信服。丁母忧。五年，调福昌主簿。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。试六论，旧不起草，以故文多不工。轼始具草，文义粲然。复对制策，入三等。自宋初以来，制策入三等，惟吴育与轼而已。除大理评事，签书凤翔府判官。关中自元昊叛，民贫役重，岐下岁输南山木筏，自渭入河，经砥柱之险，衙吏踵破家。轼访其利害，为修衙规，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，自是害减半。治平二年，入判登闻鼓院。英宗自藩邸闻其名，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，知制诰。宰相韩琦曰：“轼之才，远大器也，他日自当为天下用，要在朝廷培养之。使天下之士，莫不畏慕降伏，皆欲朝廷进用，然后取而用之，则人人无复异词矣。今骤用之，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，适足以累之也。”英宗曰：“且与修注如

何？”琦曰：“记注与制造为邻，未可遽授。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，且请召试。”英宗曰：“试之未知其能否，如轼有不能邪？”琦犹不可，及试二论，复入三等，得直史馆。轼闻琦语，曰：“公可谓爱人以德矣。”会洵卒，赙以金帛，辞之，求赠一官，于是赠光禄丞。洵将终，以兄太白早亡，子孙未立，妹嫁杜氏，卒未葬，属轼。轼既除丧，即葬姑。后官可荫，推与太白曾孙彭。熙宁二年，还朝。王安石执政，素恶其议论异己，以判官告院。四年，安石欲变科举，兴学校，诏两制、三馆议。轼上议曰：“得人之道，在于知人；知人之法，在于责实。使君相有知人之明，朝廷有责实之政，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，而况于学校贡举乎？虽因今之法，臣以为有余。使君相不知人，朝廷不责实，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，而况学校贡举乎？虽复古之制，臣以为不足。夫时有可否，物有兴废，方其所安，虽暴君不能废，及其既厌，虽圣人不能复。故风俗之变，法制随之，譬如江河之徙移，强而复之，则难为力。庆历固尝立学矣，至于今日，惟有空名仅存。今将变今之礼，易今之俗，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，敛民财以食游士。百里之内，置官立师，狱讼听于是，军旅谋于是，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，则无乃徒为纷乱，以患苦天下邪？若乃无大更革，而望有益于时，则与庆历之际何异？故臣谓今之学校，特可因仍旧制，

使先王之旧物，不废于吾世足矣。至于贡举之法，行之百年，治乱盛衰，初不由此。陛下视祖宗之世，贡举之法，与今为孰精？言语文章，与今为孰优？所得人才，与今为孰多？天下之事，与今为孰办？较此四者之长短，其议决矣。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：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，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，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，或欲经生不贴墨而考大义，此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者也。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，区区之法何预焉。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。夫性命之说，自子贡不得闻，而今之学者，耻不言性命，读其文，浩然无当而不可穷，观其貌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，此岂真能然哉！盖中人之性，安于放而乐于诞耳。陛下亦安用之？”议上，神宗悟曰：“吾固疑此，得轼议，意释然矣。”即日召见，问：“方今政令得失安在？虽朕过失，指陈可也。”对曰：“陛下生知之性，天纵文武，不患不明，不患不勤，不患不断，但患求治太急，听言太广，进人太锐。愿镇以安静，待物之来，然后应之。”神宗悚然曰：“卿三言，朕当熟思之。凡在馆阁，皆当为朕深思治乱，无有所隐。”轼退，言于同列。安石不悦，命权开封府推官，将困之以事。轼决断精敏，声闻益远。会上元敕府市浙灯，且令损价。轼疏言：“陛下岂以灯为悦？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。然百姓不可户晓，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。

此事至小，体则甚大，愿追还前命。”即诏罢之。时安石创行新法，轼上书论其不便，曰：“臣之所欲言者，三言而已。愿陛下结人心，厚风俗，存纪纲。人主之所恃者，人心而已，如木之有根，灯之有膏，鱼之有水，农夫之有田，商贾之有财。失之则亡，此理之必然也。自古及今，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，刚果自用而不危者。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。祖宗以来，治财用者不过三司。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，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，使六七少年，日夜讲求于内，使者四十余辈，分行营干于外。夫制三司条例司，求利之名也；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，求利之器也。造端宏大，民实惊疑；创法新奇，吏皆惶惑。以万乘之主而言利，以天子之宰而治财，论说百端，喧传万口，然而莫之顾者，徒曰：‘我无其事，何恤于人言。’操罔罢而入江湖，语人曰‘我非渔也’，不如捐罔罢而人自信。驱鹰犬而赴林藪，语人曰‘我非猎也’，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。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，则莫若罢条例司。今君臣宵旰，几一年矣，而富国之功，茫如捕风，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，祠部度五千余人耳。以此为术，其谁不能？而所行之事，道路皆知其难。汴水浊流，自生民以来，不以种稻。今欲陂而清之，万顷之稻，必用千顷之陂，一岁一淤，三岁而满矣。陛下遂信其说，即使相视地形，所在凿空，访寻水利，

妄庸轻剽，率意争言。官司虽知其疏，不敢便行抑退，追集老少，相视可否。若非灼然难行，必须且为兴役。官吏苟且顺从，真谓陛下有意兴作，上靡帑廩，下夺农时。堤防一开，水失故道，虽食议者之肉，何补于民！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？自古役人，必用乡户。今者徒闻江、浙之间，数郡顾役，而欲措之天下，单丁、女户，盖天民之穷者也，而陛下首欲役之。富有四海，忍不加恤！自杨炎为两税，租调与庸既兼之矣，奈何复欲取庸？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，庸钱不除，差役仍旧，推所从来，则必有任其咎者矣。青苗放钱，自昔有禁。今陛下始立成法，每岁常行，虽云不许抑配，而数世之后，暴君污吏，陛下能保之与？计愿请之户，必皆孤贫不济之人，鞭撻已急，则继之逃亡，不还，则均及邻保，势有必至，异日天下恨之，国史记之，曰‘青苗钱自陛下始’，岂不惜哉！且常平之法，可谓至矣。今欲变为青苗，坏彼成此，所丧逾多，亏官害民，虽悔何及！昔汉武帝以财力匱竭，用贾人桑弘羊之说，买贱卖贵，谓之均输。于时商贾不行，盗贼滋炽，几至于乱。孝昭既立，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，天下归心，遂以无事。不意今日此论复兴。立法之初，其费已厚，纵使薄有所获，而征商之额，所损必多。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，以一牛易五羊，一牛之失，则隐而不言；五羊之获，则指为劳绩。今坏常平

而言青苗之功，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，何以异此？臣窃以为过矣。议者必谓：‘民可与乐成，难与虑始。’故陛下坚执不顾，期于必行。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。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。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，此也。国家之所以存亡者，在道德之浅深，不在乎强与弱；历数之所以长短者，在风俗之薄厚，不在乎富与贫。人主知此，则知所轻重矣。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，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。爱惜风俗，如护元气。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，勇悍之夫可以集事，忠厚近于迂阔，老成初若迟钝。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，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。仁祖持法至宽，用人有叙，专务掩覆过失，未尝轻改旧章。考其成功，则曰未至。以言乎用兵，则十出而九败；以言乎府库，则仅足而无余。徒以德泽在人，风俗知义，故升遐之日，天下归仁焉。议者见其末年更多因循，事不振举，乃欲矫之以苛察，齐之以智能，招来新进勇锐之人，以图一切速成之效。未享其利，浇风已成。多开骤进之门，使有意外之得。公卿侍从跬步可图，俾常调之人，举生非望，欲望风俗之厚，岂可得哉？近岁朴拙之人愈少，巧进之士益多。惟陛下哀之救之，以简易为法，以清净为心，而民德归厚。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，此也。祖宗委任台谏，未尝罪一言者。纵有薄责，旋即超升，许以风闻，而无官长。

言及乘輿，则天子改容；事关廊庙，则宰相待罪。台谏固未必皆贤，所言亦未必皆是。然须养其锐气，而借之重权者，岂徒然哉？将以折奸臣之萌也。今法令严密，朝廷清明，所谓奸臣，万无此理。然养猫以去鼠，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；畜狗以防盗，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。陛下得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，下为子孙万世之防？臣闻长老之谈，皆谓台谏所言，常随天下公议。公议所与，台谏亦与之；公议所击，台谏亦击之。今者物论沸腾，怨讟交至，公议所在，亦知之矣。臣恐自兹以往，习惯成风，尽为执政私人，以致人主孤立，纪纲一废，何事不生！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，此也。”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，因试进士发策，以“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，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，齐桓专任管仲而霸，燕哱专任子之而败，事同而功异”为问。安石滋怒，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，穷治无所得，轼遂请外，通判杭州。高丽入贡，使者发币于官吏，书称甲子。轼却之曰：“高丽于本朝称臣，而不禀正朔，吾安敢受！”使者易书称熙宁，然后受之。时新政日下，轼于其间，每因法以便民，民赖以安。徙知密州。司农行手实法，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。轼谓提举官曰：“违制之坐，若自朝廷，谁敢不从？今出于司农，是擅造律也。”提举官惊曰：“公姑徐之。”未几，朝廷知法害民，罢之。有盗窃发，安抚

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，卒凶暴恣行，至以禁物诬民，入其家争斗杀人，且畏罪惊溃，将为乱。民奔诉轼，轼投其书不视，曰：“必不至此。”散卒闻之，少安，徐使人招出戮之。徙知徐州。河决曹村，泛于梁山泊，溢于南清河，汇于城下，涨不时洩，城将败，富民争出避水。轼曰：“富民出，民皆动摇，吾谁与守？吾在是，水决不能败城。”驱使复入。轼诣武卫营，呼卒长，曰：“河将害城，事急矣，虽禁军且为我尽力。”卒长呼曰：“太守犹不避涂潦，吾侪小人，当效命。”率其徒持畚鍤以出，筑东南长堤，首起戏马台，尾属于城。雨日夜不止，城不沉者三版。轼庐于其上，过家不入，使官吏分堵而守，卒全其城。复请调来岁夫，增筑故城，为木岸，以虞水之再至，朝廷从之。徙知湖州，上表以谢。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，以诗托讽，庶有补于国。御史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摭其表语，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，逮赴台狱，欲置之死。锻炼久之，不决。神宗独怜之，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。轼与田父野老，相从溪山间，筑室于东坡，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三年，神宗数有意复用，辄为当路者沮之。神宗尝语宰相王圭、蔡确曰：“国史至重，可命苏轼成之。”圭有难色。神宗曰：“轼不可，姑用曾巩。”巩进《太祖总论》，神宗意不允，遂手札移轼汝州，有曰：“苏轼黜居思咎，阅岁滋深，人材实难，不

忍终弃。”轼未至汝，上书自言饥寒，有田在常，愿得居之。朝奏，夕报可。道过金陵，见王安石，曰：“大兵大狱，汉、唐灭亡之兆。祖宗以仁厚治天下，正欲革此。今西方用兵，连年不解，东南数起大狱，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？”安石曰：“二事皆惠卿启之，安石在外，安敢言？”轼曰：“在朝则言，在外则不言，事君之常礼耳。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，公所以待上者，岂可以常礼乎？”安石厉声曰：“安石须说。”又曰：“出在安石口，入在子瞻耳。”又曰：“人须是知行一不义，杀一不辜，得天下弗为，乃可。”轼戏曰：“今之君子，争减半年磨勘，虽杀人亦为之。”安石笑而不言。至常，神宗崩。哲宗立，复朝奉郎、知登州，召为礼部郎中。轼旧善司马光、章惇。时光为门下侍郎，惇知枢密院，二人不相合，惇每以谗侮困光，光苦之。轼谓惇曰：“司马君实时望甚重，昔许靖以虚名无实，见鄙于蜀先主，法正曰：‘靖之浮誉，播流四海，若不加礼，必以贱贤为累。’先主纳之，乃以靖为司徒。许靖且不可慢，况君实乎？”惇以为然，光赖以少安。迁起居舍人。轼起于忧患，不欲骤履要地，辞于宰相蔡确。确曰：“公徊翔久矣，朝中无出公右者。”轼曰：“昔林希同在馆中，年且长。”确曰：“希固当先公邪？”卒不许。元祐元年，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，即赐银绯，迁中书舍人。初，祖宗时，差役行久生弊，编户充役

者不习其役，又虐使之，多致破产，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。王安石相神宗，改为免役，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，行法者过取，以为民病。司马光为相，知免役之害，不知其利，欲复差役，差官置局，轼与其选。轼曰：“差役、免役，各有利害。免役之害，掊敛民财，十室九空，敛聚于上，而下有钱荒之患。差役之害，民常在官，不得专力于农，而贪吏猾胥，得缘为奸。此二害轻重，盖略等矣。”光曰：“于君何如？”轼曰：“法相因则事易成，事有渐则民不惊。三代之法，兵农为一，至秦始分为二，及唐中叶，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。自尔以来，民不知兵，兵不知农，农出谷帛以养兵，兵出性命以卫农，天下便之。虽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今免役之法，实大类此。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，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，盖未易也。”光不以为然。轼又陈于政事堂，光忿然。轼曰：“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，公为谏官，争之甚力，韩公不乐，公亦不顾。轼昔闻公道其详，岂今日作相，不许轼尽言耶？”光笑之。寻除翰林学士。二年，兼侍读。每进读至治乱兴衰、邪正得失之际，未尝不反覆开导，觐有所启悟。哲宗虽恭默不言，辄首肯之。尝读祖宗《宝训》，因及时事。轼历言：“今赏罚不明，善恶无所劝沮；又黄河势方北流，而强使之东；夏人入镇戎，杀掠数万人，帅臣不以闻。每事如此，恐浸成衰乱之渐。”轼尝锁宿

禁中，召入对便殿。宣仁后问曰：“卿前年为何官？”曰：“臣为常州团练副使。”曰：“今为何官？”曰：“臣今待罪翰林学士。”曰：“何以遽至此？”曰：“遭遇太皇太后、皇帝陛下。”曰：“非也。”曰：“岂大臣论荐乎？”曰：“亦非也。”轼惊曰：“臣虽无状，不敢自他途以进。”曰：“此先帝意也。先帝每诵卿文章，必叹曰‘奇才！奇才！’但未及进用卿耳。”轼不觉哭失声。宣仁后与哲宗亦泣，左右皆感涕。已而命坐赐茶。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。三年，权知礼部贡举。会大雪苦寒，士坐庭中，噤不能言。轼宽其禁约，使得尽技。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，且持暧昧单词，诬以为罪，轼尽奏逐之。四年，积以论事，为当轴者所恨。轼恐不见容，请外，拜龙图阁学士、知杭州。未行，谏官言：前相蔡确知安州，作诗借郝处俊事，以讥太皇太后。大臣议迁之岭南。轼密疏：朝廷若薄确之罪，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；若深罪确，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。谓宜皇帝敕置狱逮治，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，则于仁孝两得矣。宣仁后心善轼言，而不能用。轼出郊，用前执政恩例，遣内侍赐龙茶、银台，慰劳甚厚。既至杭，大旱，饥疫并作。轼请于朝，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，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。明年春，又减价糴常平米，多作饘粥药剂，遣使挟医，分坊治病，活者甚众。轼曰：“杭，水陆之会，疫死比他处常多。”乃

衰羨缗得二千，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，以作病坊，稍畜钱粮待之。杭本近海，地泉咸苦，居民稀少。唐刺史李泌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，民足于水。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，自河入田，所溉至千顷，民以殷富。湖水多葑，自唐及钱氏，岁辄浚治。宋兴，废之，葑积为田，水无几矣。漕河失利，取给江潮，舟行市中，潮又多淤，三年一淘，为民大患，六井亦几于废。轼见茅山一河，专受江潮，盐桥一河，专受湖水，遂浚二河以通漕。复造堰闸，以为湖水蓄洩之限，江潮不复入市。以余力复完六井。又取葑田积湖中，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，以通行者。吴人种菱，春辄芟除，不遗寸草。且募人种菱湖中，葑不复生。收其利以备修湖，取救荒余钱万缗、粮万石，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。堤成，植芙蓉、杨柳其上，望之如画图。杭人名为苏公堤。杭僧净源，旧居海滨，与舶客交通。舶至高丽，交誉之。元丰末，其王子义天来朝，因往拜焉。至是，净源死，其徒窃持其像，附舶往告。义天亦使其徒来祭，因持其国母二金塔，云祝两宫寿。轼不纳，奏之曰：“高丽久不入贡，失赐予厚利，意欲求朝，未测吾所以待之厚薄，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。若受而不答，将生怨心；受而厚赐之，正堕其计。今宜勿与知，从州郡自以理却之。彼庸僧猾商，为国生事，渐不可长，宜痛加惩创。”朝廷皆从之。未几，贡

使果至。旧例，使所至吴越七州，费二万四千余缗。轼乃令诸州量事裁损，民获交易之利，无复侵挠之害矣。浙江潮自海门东来，势如雷霆，而浮山峙于江中，与渔浦诸山，犬牙相错，洄洑激射，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。轼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，并山而东，凿为漕河，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。又并山为岸，不能十里以达龙山大慈浦，自浦北折抵小岭，凿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古河，浚古河数里，达于龙山漕河，以避浮山之险。人以为便。奏闻，有恶轼者力沮之，功以故不成。轼复言：“三吴之水，潴为太湖，太湖之水，溢为松江以入海。海日两潮，潮浊而江清，潮水常欲淤塞江路，而江水清驶，随辄涤去，海口常通，则吴中少水患。昔苏州以东，公私船皆以篙行，无陆挽者。自庆历以来，松江大筑挽路，建长桥以扼塞江路，故今三吴多水，欲凿挽路、为千桥，以迅江势。”亦不果用，人皆以为恨。轼二十年间，再莅杭，有德于民，家有画像，饮食必祝。又作生祠以报。六年，召为吏部尚书，未至。以弟辙除右丞，改翰林承旨。辙辞右丞，欲与兄同备从官，不听。轼在翰林数月，复以谗请外。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。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，吏不究本末，决其陂泽，注之惠民河，河不能胜，致陈亦多水。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，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。轼始至颍，遣吏以水平准之，淮

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，若凿黄堆，淮水顾流颍地为患。轼言于朝，从之。郡有宿贼尹遇等，数劫杀人，又杀捕盗吏兵。朝廷以名捕不获，被杀家复惧其害，匿不敢言。轼召汝阴尉李直方，曰：“君能擒此，当力言于朝，乞行优赏；不获，亦以不职奏免君矣。”直方有母且老，与母诀而后行。乃緝知盗所，分捕其党与。手戟刺遇，获之。朝廷以小不应格，推赏不及。轼请以己之年劳，当改朝散郎阶，为直方赏，不从。其后吏部为轼当迁，以符合其考。轼谓已许直方，又不报。七年，徙扬州。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，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，不得留难。故操舟者辄富厚，以官舟为家，补其弊漏，且周船夫之乏，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。近岁，一切禁而不许，故舟弊人困，多盗所载以济饥寒，公私皆病，轼请复旧，从之。未阅岁，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。是岁，哲宗亲祀南郊，轼为卤簿使，导驾入太庙。有赭伞犊车并青盖犊车十余争道，不避仪仗。轼使御营巡检使问之，乃皇后及大长公主。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，轼曰：“中丞职当肃政，不可不以闻。”之纯不敢言，轼于车中奏之。哲宗遣使赍疏驰白太皇太后。明日，诏整肃仪卫，自皇后而下，皆毋得迎谒。寻迁礼部兼端明殿、翰林侍读两学士，为礼部尚书。高丽遣使请书，朝廷以故事尽许之。轼曰：“汉东平王请诸子及《太史公书》，犹不肯予。高丽所请，

有甚于此，其可予乎？”不听。八年，宣仁后崩，哲宗亲政。轼乞补外，以两学士出知定州。时国是将变，轼不得入辞。既行，上书言：“天下治乱，出于下情之通塞。至治之极，小民皆能自通；迨于大乱，虽近臣不能自达。陛下临御九年，除执政、台谏外，未尝与群臣接。今听政之初，当以通下情、除壅蔽为急务。臣日侍帷幄，方当戎边，顾不得一见而行，况疏远小臣，欲求自通，难矣。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，不效愚忠。古之圣人将有为也，必先处晦而观明，处静而观动，则万物之情，皆陈于前，陛下圣智绝人，春秋鼎盛。臣愿虚心循理，一切未有所为，默观庶事之利害，与群臣之邪正。以三年为期，俟得其实，然后应物而作。使既作之后，天下无恨，陛下亦无悔。由此观之，陛下之有为，惟忧太早，不患稍迟，亦已明矣。臣恐急进好利之臣，辄劝陛下轻有改变，故进此说，敢望陛下留神，社稷宗庙之福，天下幸甚。”定州军政坏弛，诸卫卒骄惰不教，军校蚕食其廩赐，前守不敢谁何。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，缮修营房，禁止饮博。军中衣食稍足，乃部勒战法，众皆畏伏。然诸校业业不安，有卒史以赃诉其长，轼曰：“此事吾自治则可，听汝告，军中乱矣。”立决配之，众乃定。会春大阅，将吏久废上下之分，轼命举旧典，帅常服出帐中，将吏戎服执事。副总管王光祖，自谓老将，耻之，称疾

不至。轼召书吏使为奏，光祖惧而出，论事，无一慢者。定人言：“自韩琦去后，不见此礼至今矣。”契丹久和，边兵不可用，惟沿边弓箭社与寇为邻，以战射自卫，犹号精锐。故相庞籍守边，因俗立法。岁久法弛，又为保甲所挠。轼奏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，不报。绍圣初，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，以为讥斥先朝。遂以本官知英州。寻降一官。未至，贬宁远军节度副使，惠州安置。居三年，泊然无所蒂芥，人无贤愚，皆得其欢心。又贬琼州别驾，居昌化。昌化，故儋耳地，非人所居，药饵皆无有。初僦官屋以居，有司犹谓不可。轼遂买地筑室，儋人运甕畚土以助之。独与幼子过处，著书以为乐，时时从其父老游，若将终身。徽宗立，移廉州，改舒州团练副使，徙永州。更三大赦，遂提举玉局观，复朝奉郎。轼自元祐以来，未尝以岁课乞迁天。尝自谓：“作文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。”虽嬉笑怒骂之词，皆可书而诵之。其体浑涵光芒，雄视百代，有文章以来，盖亦鲜矣。洵晚读《易》，作《易传》，未究，命轼述其志。轼成《易传》，复作《论语说》；后居海南，作《书传》；又有《东坡集》四十卷、《后集》二十卷、《奏议》十五卷、《内制》十卷、《外制》三卷、《和陶诗》四卷。一时文人如黄庭坚、晁补之、秦观、张耒、陈师道，举世未之识，轼待之如朋侪，

未尝以师资自予也。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，必以爱君为本，忠规倘论，挺挺大节，群臣无出其右。但为小人忌恶挤排，不使安于朝廷之上。高宗即位，赠资政殿学士，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。孝宗置其文左右，读之终日忘倦，谓为文章之宗，亲制集赞，赐其曾孙峤。遂崇赠太师，谥文忠。轼三子迈、迨、过，俱善为文。迈，驾部员外郎。迨，承务郎。

论曰：苏轼自为童子时，士有传石介《庆历圣德诗》至蜀中者，轼历举诗中所言韩、富、杜、范诸贤以问其师。师怪而语之，则曰“正欲识是诸人耳。”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。弱冠，父子兄弟至京师，一日而声名赫然，动于四方。既而登上第，擢词科，入掌书命，出典方州。器识之闳伟，议论之卓犖，文章之雄隽，政事之精明，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，而以迈往之气辅之。故意之所向，言足以达其有猷，行足以遂其有为。至于祸患之来，节义足以固其有守，皆志与气所为也。仁宗初读轼、辙制策，退而喜曰：“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。”神宗尤爱其文，宫中读之，膳进忘食，称为天下奇才。二君皆有以知轼，而轼卒不得大用。一欧阳修先识之，其名遂与之齐，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，天下之至公也？相不相有命焉。呜呼！轼不得相，又岂非幸欤？或谓：“轼稍自韬戢，虽不获柄用，亦当免祸。”虽然，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

为，尚得为轼哉！

附录二 序 跋

赵夔序

昔杜预注《春秋左传》，颜籀注班固《汉书》，时人谓征南、秘书为丘明、孟坚忠臣；又李善于梁、宋之间，开《文选》学，注六十卷，流传于世，皆仆所喜而慕之者。此注东坡诗集所以作也。东坡先生读书数千万卷，学术文章之妙，若太山北斗，百世尊仰，未易可窥测藩篱，况堂奥乎！然仆自幼岁诵其诗文，手不暂释，其初如涉大海，浩无津涯，孰辨淄渑泾渭，而鱼龙异状，莫识其名，既穷山海变怪，然后了然无有疑者。崇宁年间，仆年志于学，逮今三十年，一句一字，推究来历，必欲见其用事之处。经史子传，僻书小说，图经碑刻，古今诗集，本朝故事，无所不览；又于道释二藏经文，亦常遍观钞节，及询访耆旧老成间，其一时见闻之事，有得既已多矣。顷者赴调京师，

继复守官，累与小坡叔党游从至熟，叩其所未知者，叔党亦能为仆言之。仆既慕先生甚切，精诚感通，一日，梦先生野服乘驴若世之所画李太白者，惠然见访。仆方坐一室中，书史环列，起而迎见，先生顾仆，喜曰：“天下之乐，莫大于此。”了无他语。又一日，梦与先生对谈，因问水仙王事，即答以茫昧之语，殊不可晓，不知何意也。仆于此诗分五十门，总括殆尽，凡偶用古人两句，用古人一句，用古人六字、五字、四字、三字、二字，用古人上下句中各四字、三字、一字相对，止用古人意不用字，所用古人字不用古人意，能造古人意，能造古人不到妙处，引一时事，一句中用两故事，疑不用事而是用事，疑是用事而不用事，使道经僻事、释经僻事、小说僻事、碑刻中事，州县图经事，错使故事使古人作用字成一家句法，全类古人诗句用事有所不尽，引用一时小话不用故事而句法高胜，句法明白而用意深远，用字或有未稳，无一字无来历，点化古诗拙言，间用本朝名人诗句，用古人词中佳句，改古人句中借用故事，有偏受之故事，有参差之语言，诗中自有奇对，自撰古人名字，用古谣言，用经史注中隐事，间俗语俚谚诗意物理，此其大略也。三十年中，殚精竭虑，仆之心力，尽于此书。今乃编写刊行，愿与学者共之。若乃事有遗误，当俟博雅君子补而镌之，庶俾先生之诗文与《左传》、《汉

书》、《文选》并传无穷，而仆于杜预、颜籀、李善三子亦庶几焉。虽然，尚有可以言者，先生之用事，不可谓无心，先生之用古人诗句，未必皆有意耳。盖胸中之书，汪洋浩博，下笔之际，不知为我语耶、他人之语也，观者以意达之可也。西蜀赵夔尧卿撰。

王十朋序

昔秦延君注尧典二字，至十余万言，而君子讥其繁，丁子襄注《周易》一书，才二三万言，而君子恨其略。训注之学，古今所难，自非集众人之长，殆未易得其全体。况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，卓冠一世，平生斟酌经传，贯穿子史，下至小说、杂记、佛经、道书、古诗、方言，莫不毕究，故虽天地之造化，古今之兴替，风俗之消长，与夫山川、草木、禽兽、鳞介、昆虫之属，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，积而为胸中之文，不啻如长江大河，汪洋阔肆，变化万状，则凡波澜于一吟一咏之间者，讵可以一二人之学而窥其涯涘哉！予旧得公诗八注、十注，而事之载者十未能五，故常有窥豹之叹。近于暇日搜索诸家之释，裒而一之，剗繁剔冗，所存者几百人，庶几于公之诗有光。虽然，自八而十，自十而百，固非略矣，而亦未敢以繁言。

盖以一人而肩乌获之任，则折筋绝体之不暇，一旦而均之百人，虽未能春容乎通衢，张王乎大都，而北燕南越亦不难到，此则百注之意也。若夫必待读遍天下书，然后答尽韩公策，则又望诸后人焉。永嘉王十朋龟龄撰。

陆游 施司谏注东坡诗序

古诗唐虞虞歌，夏述禹戒作歌。商周之诗，皆以刊于经，故有训释。汉以后诗，见于萧统《文选》者，及高帝、项羽、韦孟、杨惲、梁鸿、赵壹之流歌诗见于史者，亦皆有注。唐诗人最盛，名家者以百数，惟杜诗注者数家，然概不为识者所取。近世有蜀人任渊，尝注宋子京、黄鲁直、陈无己三家诗，颇称详赡。若东坡先生之诗，则援据闳博，指趣深远，渊独不敢为之说。某顷与范公至能会于蜀，因相与论东坡诗，慨然谓予：“足下当作一书，发明东坡之意，以遗学者。”某谢不能。他日，又言之。因举二三事以质之曰：“‘五亩渐成终老计，九重新扫旧巢痕。’‘遥知叔孙子，已致鲁诸生。’当若为解？”至能曰：“东坡窜黄州，自度不复收用。故曰‘新扫旧巢痕’，建中初，复召元祐诸人，故曰‘已致鲁诸生’，恐不过如此。”某曰：“此

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。昔祖宗以三馆养士，储将相材，及官制行，罢三馆。而东坡盖尝直史馆，然自谪为散官，削去史馆之职久矣，至是史馆亦废，故云‘新扫旧巢痕’。其用事之严如此。而‘凤巢西隔九重门’，则又李义山诗也。建中初，韩、曾二相得政，尽收用元祐人，其不召者亦补大藩。惟东坡兄弟犹领宫祠。此句盖寓所谓不能致者二人，意深语缓，尤未易窥测。至如‘车中有布乎’，指当时用事者，则犹近而易见。‘白首沉下吏，绿衣有公言’，乃以侍妾朝云尝叹黄师是仕不进，故此句之意，戏言其上僭。则非得于故老，殆不可知。必皆能知此，然后无憾。”至能亦太息曰：“如此，诚难矣！”后二十五年，某告老居山阴泽中，吴兴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谏公所注数十大编，属某作序。司谏公以绝识博学名天下，且用功深，历岁久，又助之以顾君景蕃之该洽，则于东坡之意，亦几可以无憾矣。某虽不能如至所托，而得序斯文，岂非幸哉！嘉泰二年正月五日，山阴老民陆游序。

宋 萃 施注苏诗序一

物合于性之所近，而事常成于力之久且勤。水湿火燥，钩曲弦直，各从其类，而要皆性之所近以相合

也。物之于人不类也，是故鹿骇毛嫱，鱼避骊姬。其类殊者其性殊。人之于人类已然，且邪正杂糅，若白黑冰炭之相反，非性使然耶？予自韶齿时，闻长老言苏文忠公之为人，心窃慕效之。及就傅，读公传，向往逾摯。尝图公像悬座右。而貌予侍其侧。稍长，遍诵公集，然嗜有韵之言尤深。其始，筮仕得黄州倅，又幸与公同。呜呼，岂非天哉！公诗故有吴兴施氏元之注四十二卷，元之子宿推广为年谱，而陆放翁序之，宋嘉泰间镂版行世，其后罕流传。予常求之数十年，莫能得。及抚吴，又数数购求，始得此本于江南藏书家，第缺者十二卷。乃属毗陵邵长蘅子湘订补，且为之芟复正讹，而佐之以吴郡顾嗣立侠君泊儿子至。其续补遗诗四百余首，采摭施本所未备，别为二卷，则以属钱塘冯景山公为之注。先是永嘉王氏有《苏诗注》二十二卷，行世颇久，然有三失，分类则陋，不著书名则疏，改窜旧文则妄，诚如子湘所言，加之俗本相沿，舛讹多有，兹编出，而王氏旧本可束高阁矣。凡人喜磊落者，薄虫鱼之注，矜博雅者，搜毕方𪔐鼠之名，二者异趣，而予于苏诗注则非是之谓。盖以既慕其人，则嗜其言，既嗜其言，则索其解，解必求精，精必正谬，将使世之效法公者，因解而得其言，因言以推其心，凡忠言嘉谋，丰功亮节之大端，胥于是乎识，而析向不远矣。昔贤可法，莫不皆然，独公诗乎

哉，而予特其性之近者尔。故殫精力，积岁时，完残补缺，使施注几亡而复显，殆有天焉以玉其成，而亦不自知其久且勤如此也。呜呼，迹公生平，自嘉祐登朝，历熙宁、元丰、元祐、绍圣三十余年间，论新法，迁群奸，投荒锢党，几蹈不测，而矢其孤忠，百折不回，读公诗自可知其人而论其世，则予又将以是注为糟醢也。康熙己卯夏五商丘宋荦序。

邵长蘅 题旧本施注苏诗

施氏《注东坡诗》四十二卷，镂板于宋嘉泰间，世之学者，往往知有其书，而流传绝少。商丘公购之数载，从江南藏书家得此本，又残缺仅存三十卷。是书卷端题吴兴施氏、吴郡顾氏而不著名，而序文目录又阙，故览者莫得其详也。其后得陆放翁所作《施注苏诗序》，有云“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谏公所注数十大编属余序”，又云“助之以顾子景繁之该洽”。又按《文献·经籍考》载，司谏名元之，字德初，其注诗本末，与序合。又参考郡邑志及他书，而三君之名字，乃灼然亡疑。商丘公幸是书之存而惜其残缺也，进门下士邵长蘅属以订补，为之缀缺正讹，芟芜省复，而所谓四十二卷者，犁然复完，可版行。闻之昌黎言，

用功深者，其收名也远。故夫文章之士，仰面屋梁，搢擢心肾，几幸得自表见，使有身后名耳。及观施氏父子，萃数十年心力成是编，其用功不为不深，而垂四百余年，若灭若没，其姓名亦且从狐狸□貉吻中抉而出之，而仅仅不泯，盖其传之之难如是。而注苏之割裂纰缪，如世所传永嘉王氏本，其出施氏下远甚，而顾得行世，岂亦有幸不幸欤？然而书之不足传者，虽幸而见称于人，譬之秋潦汪洋，倏归乌有，而其必传者，或忽于近而贵于远，或晦于昔而大显于今，虽经虫啮蠹蚀之余，而若有物冯之，不可磨灭。注一家诗之兴废，其微焉耳，然亦有可感者。是编出，吾知其必将焯然与东坡诗并垂久远，无有能起而盖之者矣。康熙己卯孟陬六日，毗陵邵长蘅题。

查慎行 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例略

余于苏诗，性有笃好，向不满于王氏注，为之驳正瑕□，零丁件系，收弃篋中，积久渐成卷帙。后读《渭南集》，乃知有施注苏诗。旧本苦不易购，庚辰春与商丘宋山言并客辇下，忽出新刻本见贻。检阅终卷，于鄙怀颇有未愜者，因复补辑旧闻，自忘芜陋，将出以问世。公诗自仁宗嘉祐己亥始见集中，所谓《南行

集》也。从来编年者，或起辛丑，或起壬寅，《南行集》乃己亥庚子诗，反置续集中，殊失位置。考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，有《南征集》一卷，当时此卷本自单行。今自《郭纶》及《初发嘉州》以下，编次一准《栾城集》。惟是先生升沉中外，时地屡易，篇什繁多，必若部居州次，一一不爽，自非朝夕从游，畴能定之。施元之、顾景繁生南渡时，去先生之世未远，排纂尚有舛错。如《客位假寐》一首，凤翔所作，而入倅杭时；《次韵曹九章》一首，黄州所作，而入守湖州时。姑举二段，以见编年之难。凡慎所辨正，必先求之本诗及手书真迹，又参以同时诸公文集，泊宋元名家诗话题跋，年经诗纬，用以审定前后。兹集旧有八注、十注，同时稍后者有唐子西、赵夔等注。乾道末，御制序刊行。绍兴中有吴兴沈氏注，漳州黄学皋补注，今皆不传。传者惟王氏施氏两家耳。施氏本又多残脱，近从吴中借钞一本，每首视新刻，或多一二行，乃知新刻复经增删，大都掇拾王氏旧说，失施氏面目矣。今于施注原本所有而新刻所删者，辄补录以存其旧，漫不可辨者则缺之。若乃当代文献，信而足征，宁容缺略，赵叔平、张退傅、张天觉、李诚之、徐德占、刘仲冯、刘壮舆诸公，《宋史》各有传，非泯泯无闻者。仁宗朝之制科，范景仁之新乐，王介甫之新法，种谊之禽鬼章，邢恕之构宣仁，王韶之启边衅，何以一无援证。

元祐初年议回河，七年议郊祀，周思道等先后论榷蜀茶，诠释亦复影响模糊，皆疏漏之大者，余无论矣。本集诗与他集互见者，凡九十余篇，皆施氏原本所无也。新刻本收入续补上下卷，王氏本散见于分类中，贗作极多，要归于别真贗、去重复、无脱露而已。和陶诗，子由有序，自成二卷，细考之，惟《饮酒》二十章和于扬州官舍，余悉绍圣甲戌后自惠迁儋七年中作也。岁月大略可稽，分之各卷，以符编年之例。其间亦有未能确指年月者，则以意推之，要难迁就他所也。文字之祸，于公为烈，始而牵连诗帐，终则禁及藏书，散轶固多，收藏不乏。今从简编中留心搜辑，共得逸诗一百二十余首。又唐人所谓口号，皆近体诗也，张燕公有《十五夜御前口号》，少陵《紫宸殿退朝口号》、《西阁口号》之类是也。宋人帖子词及致语口号，犹仍其旧。施氏原注有帖子词一卷，目录尚存，新刻妄为删削，今一并采入，与逸诗厘为三卷。补注之役，权輿于癸丑，迨己未、庚申后，往还黔、楚，每以一编自随。己卯冬，渡淮北上，水触舟裂，从泥沙中检得残本，淹浥破烂，重加缀葺。辛巳夏，自都南还，夜泊吴门，遇盗探囊，肱篋之余，此书独无恙也。自念头童齿豁，半生著述，不登作者之堂，庶几托公诗以传后，因闭门戢影，毕力于斯，追维始事，迄今盖三十年矣。虽蠡测管窥，何足仰佐万一，顾视

世之开局于五月，葳事于腊月，半年勒限，草促成书，浅深得失，必有能辨之者。康熙壬午仲春，初白庵主人查慎行识。【诂案】查注无序，今摘其例略之要，都为一通，存之。

翁方纲 苏诗补注序

昔赵东山有《左传补注》，近时惠松厓又有《左传补注》，盖补之为辞，不嫌于复也。方纲幸得详考施、顾二家苏诗注本，始知海宁查氏所补者，犹或有所未尽。闻前辈于山谷诗任注、半山诗李注序叶残字，皆访求珍录，盖古人一字之遗，后人皆得援据以资考证。是以凡原注所有者，摭残拾坠，录存于篋久矣。歙县曹吉士从方纲订析苏诗疑义，日钞一二条，遂成此帙，而方纲之管见，亦窃附一二于师友绪余之末者，欲以益彰原注之美尔。乾隆四十七年春正月十有二日，大兴翁方纲书。

冯应榴 苏文忠诗合注自序

余弱冠以前于苏文忠公诗，全未涉猎也。释褐南

归，舟中略讽诵之，亦未究心也。迨后宦途驰逐二十余年，无暇从事研求，中间使蜀，曾一谒眉山故里，肃然起敬，而于诗仍未能深为玩味也。丁未初夏，公退余闲，偶取王、施、查三本之注，各披阅一过，见其体例互异，卷帙不同，无以取便读者，爰为合而订之，意不过择精要、删复出焉耳。及寻绎再四，乃知所注各有舛讹，因援证群书，并得诸旧注本参稽辨补，朝夕不辍者，凡七年而粗就。虽学植浅薄，万万不及前人，而心志之专，力所能到者，无不尽焉；所不能到者，歉然而已。先是己酉嘉平，忽梦与文忠相见，曾倩人绘《梦苏图》，并自为文记之。后阅赵尧卿序，亦载作注时两经梦苏事。夫以尧卿之去公未远，创始为注，积三十年，其见梦也固宜。乃若余之捃拾旧编，了无心得者，而梦适相类，益慨然于古今人愚虽不同，而向往之殷无异，则文忠之灵昭然七百余载间者，随学人所得之深浅，而皆有以后牖之乎？若谓余之合注，足以希踪往哲，亦致默相感召，此实瞿然不敢自信者已。乾隆癸丑冬下浣，桐乡冯应榴自序。

纪昀 苏文忠公诗集序

余点论是集，始于丙戌之五月。初以墨笔，再阅

改用朱笔，三阅又改用紫笔，交互纵横，递相涂乙，殆模糊不可辨识，友朋传录，各以意去取之。续于门人葛编修正华处，得初白先生手批本，又补写于罅隙之中，益硃鞣难别。今岁六月，自乌鲁木齐归，长昼多暇，因缮此净本，以便省览，盖至是凡五阅矣。乾隆辛卯八月，河间纪昀晓岚记。

王文诰 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自序

夫诗之作也，所以明志而永言也。聿自羲文洩□，而天地之形声括为文字，其自然流露于不可知者，而音以谐焉，律以和焉，圣人但因之以垂教立极而已。尧曰“咨尔舜，天之历数在尔躬”，尧之诗也。舜亦以命禹，而曰“股肱喜哉，元首起哉”，舜之诗也。禹钦舜德广运，而曰“戒之用休，董之用威”，禹之诗也。《典》、《谟》降而《誓》、《诰》作，而汤曰“时日曷丧”，武曰“我武惟扬”，汤、武之诗也。于是有圣人之德者，不皆在天子位，而周公居东室，有侮予之叹，孔子赞《易传》，叶余庆之辞，是为周公、孔子之诗，而宣播声章、著明文言者此也。其后灵均被放，《离骚》继作。离骚者，罹其忧也。自西伯拘美而拊琴演卦，洗心厄穷，斯实酸辛惻怛之始，而亦《宛》、

《弁》、《荡》、《板》之遗。使德非先觉，心非闵忧，则文人凌杂，虽美弗传，虽传奚法？故忠义者吐属之血脉，而忧患者词赋之波澜，谗谄高张，何异流言四国，是皆发乎性情之正而不能止者，其世道风会之变，盖自周而已然也。当周之世，成、康既没，颂声寝而怨悱交作。时有苏公者，仕于周而为卿士所譖，因赋《何人斯》章，“不入我门”，“云不我可”，念旧好也。“我闻其声”，“其为飘风”，伤祇搅也。“遑脂尔车”，“尔还而入”，终切望也。“出此三物”，“有覼面目”，穷反侧也。诗虽绝之，而冀以迁善悔祸，不著其譖，故孔子取之，而子夏为之序，曰：“苏公刺暴公也。”诗人忠厚之旨也。诗列《小旻之什》。阅一千四百余载，至宋，而其后嗣文忠公继起，公之诗庶矣。然约举其要，则亦本诸垂教立极者也。“定策天知我，膺期止一章”，尧之“历数尔躬”也。“四海望陶冶，赤手降於菟”，舜之“股肱元首”也。“未敢书上瑞，何人折其锋”，禹之“戒休董威”也。“根株穷脉缕，堕网不知羞”，汤之“民欲偕亡”也。“官军取乞□，尺书招赞普”，武之“杀伐用张”也。“获此不贪宝，河流正东酺”，周公之“绸缪牖户”也。“忠义老研磨，惟我独也正”，孔子之“履霜坚冰”也。至序所谓暴公譖苏公者，公诗尤倍蓰焉。“闲花亦偶载，已偃手种松”，则慨维暴而申亲厚也。“车轂鸣枕中，丝声不附木”，

则逝梁陈而警愧畏也。“萧散满霜风，凉月今宵挂”，则行安亟而致盱眙也。“孤生知永弃，吾道无南北”，则测鬼域而视罔极也。是皆同于《何人斯》章，亦诗人忠厚之旨也。然苏公诗后无征，而公之孤忠斥逐，差与灵均为近。史迁谓《骚》自怨生，指大义远，志洁行廉，不容自疏，而《怀沙》一篇，伤怀永哀，郁结纡轸，终莫能释出之，濯淖污中以浮游尘埃之外，或滞凝焉。公正道直行，竭智尽忠，谗人间之，困惫折辱，而其诗上溯唐虞，下逮齐鲁，明道德之广崇，嫖治乱之条贯，参观穷达之理，与灵均信一致矣。独其生平用图史为园囿，文章为鼓吹，及迁海上，亦皆罢去，惟肆意乎陶咏。陶家弊游走，自量必貽俗患，俯仰辞世，而公早不自觉，婴犯世难，意甚愧之。复有《园田》、《下噍》之思，《影》、《形》、《神释》之寄。盖其托为讽谏，原欲有补君国，而天性乐易，怨无自生，故能以陶自广，全其晚节。此较闻沧浪而卒不返者，殆又各行其志，而公则皤然泥而不滓者也。其于诗道，诚大备矣。顾世无孔子，何从折衷而蔽之于一，若程伊川发妙理于储祥，朱晦庵继遗音于梅落，张南轩考门牡于下闭，吕伯恭证壶解于浮环，真西山惩有欲于归来，魏华父戒负愧于司贡，亦足羽翼篇章，扶持世教，然未易赅其全也。乾隆庚寅，诰七龄矣，方从塾师章句读，会有求贷于先君者，已而以文忠公

诗文集为报。先君举以授诰，且诏曰：“异日汝与经史相发明也。”诰谨受而藏之，由是行役之暇，手订是编，未尝一日去左右，旁搜注义，凡百十余家，诗旨会通，足与李、杜、韩集并重，爰序而刊之，用以明先君之意焉，谨序。嘉庆乙亥元旦，仁和王文诰见大撰。